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
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
学习，在学习中学品悟、奋斗和超越。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
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
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学习，在学习中学品悟、奋斗和超越。

名家视界 书库丛书

从 **北大** 走出的 史学家

刘国生◎主编

四

CONGBEIDA
ZOUCHUDE
SHIXUEJIA



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
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手不释卷的阅读中把握人生。从体验中
学习，在学习中学品悟、奋斗和超越。有一种财富叫精神，有一种高贵叫文明。走
进北大清华，走近文化名家，让我们一种需仰视才见的高度中拓展视野，在一种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从
北
大

k82
3365.3

走出的史学家 (四)

刘国生 主编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北大走出的史学家/刘国生主编.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7. 12

(名家视界书库丛书: 2)

ISBN 978 - 7 - 80675 - 590 - 7

I. 从… II. 刘… III. 史学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523 号

从北大走出的史学家

刘国生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电 话	0470-8222592
邮 编	021008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瑞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1 字数 25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675 - 590 - 7

定价: 119.80 元 (全四册)

了搜集整理新资料的要求，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学问家；外国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学资料的掠夺激起了中国学者搜集保存新资料的热情，这是史语所创办的客观原因。傅斯年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底，又精通西方史料学、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超众的领导、组织能力，这是他能够走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前列，成功地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观条件和关键之所在。

2. 乱世英豪：史语所的栋梁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10月，民国大学院（后改名为教育部）成立，院长蔡元培根据其组织条例，聘请了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为其中之一。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决定，先设立理化实验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即社会学）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以后再增设其他研究所。可见中央研究院最初的研究方向，偏重于自然科学方面。

同年秋，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创建语言历史



研究所，他一面指导研究生，出版《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一面做考古发掘、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同时注意搜求文献资料，派顾颉刚去上海、北平购买图书，共购得古籍 10 余万册。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它使用的是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是与生物、地质等自然科学相同的手段，它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仅在于学科的分工不同。就是说，历史学、语言学可以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科学。他极力向蔡元培陈述这两项研究工作的重要，建议中央研究院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8 年 3 月，中华民国大学院聘请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常务筹备委员。4 月 10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民国大学院脱离隶属关系，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关。同月，蔡元培出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约与此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广州

中山大学校内。这一年夏天，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专门从事筹备建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为了明确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5月，他撰写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页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将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作了比较。他说，欧洲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是近代才发达起来的，它起步虽然晚，成就却很大。欧洲近代历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更新、研究材料的挖掘和研究方法的扩充。他说：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欧洲近代的语言学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便发展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语学，都已是蔚为大观，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他说，历史学语言学在中国发展甚早。公元前 2 世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地比勘考订，到北宋晚期这些方面又有惊人的进步。可是元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明朝人崇尚浮夸，所以史学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明清之际，浙东学派开了“一个好端涯”，清初顾亭林的历史考证、音韵学研究，阎若璩的历史地理及辨伪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但是后来中国的历史、语言学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下去，时至今日，不少人还在那里修元史、修清史，做官样文章，拒斥新材料，甚至连外国人都在极力搜求的甲骨文字也被视为废品，这在观念上、研究方法上都是一个大倒退。总之，傅斯年认为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发展早，有着光辉的历史，但近代落伍了。欧洲的历史学、语言学是近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但其水平已远远超

过中国。

接着，他分析了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落后的原因，指出了判定这两门学问进步与否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都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们毁了很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家之相竞如斗宝



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与历史学亦复如此。

他指出，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学、语言学之所以有“光荣的历史”，就是因为“能开拓地用材料”。后来之所以式微、落后，“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扩充了，工具不添新了。”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三条宗旨。一是“保持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的遗训”，充分利用新旧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问题”。二是扩充研究的材料。三是扩张研究的工具。这三条宗旨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他说：

这三件实在是一句话，没有客观的处理史学或语言学的题目之精神，即所谓亭林、百诗的遗训者，是不感觉着扩充材料之必要，且正扩充不了，若不扩张工具，也不能实现这精神，处置这材料。

而后，他又从上述三条宗旨的负面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反对“国故”这个概念，历史学、语言学的研究不应当以国别为分野。第二，反对疏通，反对推论，更不容许假设，应取“存而不补”，“证

而不疏”的态度。第三，这样的学术研究，“没有一般的用处”，所以不应普及。

最后，他简单介绍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具体打算。一是沿京汉铁路，从安阳到易县，做考古发掘、调查，二是从洛阳向西直至中亚，建立几个工作站，三是在广州附近搜集语言学、人类学方面的材料，建立南洋学。总的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重心是搜求新材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他提出了三个口号：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公布后的十年里，史语所的学者们一直恪守上述几项原则，遵照傅斯年提出的“旨趣”进行各项研究工作。比



如考古组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一处考古遗址，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一带是谭国的故地，应仿照殷墟的命名方法，称其为“谭墟”。“要按当时一般作中的风气，就要直名之为‘谭墟’了”，但傅斯年与考古组的学者们认为，这里发掘的器物，没有一件可以证明其为谭国的东西，与殷墟之发掘明显不同，所以应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原则，名之曰“城子崖”而不取“谭墟”之名。这件事能够表现出史语所学术研究的“全部风气”来，能够说明学者们是严格按照“保持亭林百诗遗训”的原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的”。劳干先生对《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

这篇里面的内容决定了以后的时期史学研究应当走的路线，至今日还没有重大的修改。

诚然自清末以来，前辈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意见和示范的工作，不是毫无一点贡献，只是都比较零碎，而影响比较上也不算最大。只有胡适之先生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和傅孟真先生《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两篇文字可以说是近年

来中国历史研究经过上的重要文献，而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

在史语所创办半个多世纪以后，李济回顾它走过的历程时也说：

他（指傅斯年）告诉研究所的同仁一个原则，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说，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必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问题，如此连环不绝，才有现代科学的发生。他这一原则我想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现在还一直遵守的。

李济、劳干都曾长期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对于傅斯年及其《历支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评论未免有过誉之处，只可视为一家之言，但是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旨趣》一文的确是史语所创立的指导思想，是它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它对于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新考据学派、史料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28年10月，也就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公开发表后的两个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市东山恤孤院后街 35 号柏园。傅斯年以专任研究员兼任所长职务。

当时，全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大都在北平各大学任教，史语所准备调查搜集和整理的新资料也都分布在北方各地。为了便于搜集新材料并吸收优秀学者参与史语所的研究工作，傅斯年决定率史语所北迁。1929 年 3 月，史语所迁至北平，所址设在北海养心斋。6 月，傅斯年主持所务会议，对史语所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起初，傅斯年等人准备在史语所里分设九个研究组，其中历史类五个，分别是：文籍考订组、史料征集组、考古组、人类及民俗组、比较艺术组；语言类四个，分别是：汉语组、西南语组、中央亚细亚语组、语言学组。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些组的研究工作难以马上展开，而且分组过细，不便于协调合作，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将相关的学科加以合并，共保留三个组，即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后来人们通常称其为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历史组聘请陈寅恪

为组长，语言组聘请赵元任为组长，考古组聘请李济为组长。原定的研究内容，除人类与民物组因课题与蔡元培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重复而取消之外，其余都包括在这三个组里。

史语所迁至北平时，适逢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到处延聘名流学者讲授中国文史诸课程。史语所里名家如云，胡适便把他们作为聘请的重要对象。当时史语所所址离北大不远，来往甚为方便，所以史语所的学者们也乐于到北京大学兼课。但是兼课多了，对本所研究工作肯定有影响，所以傅斯年对史语所研究人员外出兼课严加控制，当时被允许兼课的，只有陈寅恪、李济等几位名人。傅斯年本人也破例到北京大学兼任了教授，原因是他当时学界已享誉，可入名人之列，而北大学生多欲领略其风采，由胡适出面诚意相聘，他自然不好回绝。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学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很想从中选拔尖子人才，充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队伍。事实上，他后来的确从北京大学学生中物色到不少人才。



1929 年秋，傅斯年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他曾先后在北大讲授过《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秦汉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据邓广铭先生回忆说。他刚到北京大学读书的头一年，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决定聘史语所的学者讲商周史，他第一堂课就把傅斯年请了来，但却没把讲课的事给他讲明白。那天北大二院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傅斯年走进礼堂。才知道是被请来上课的，那堂课他讲得杂乱无章。当时有人便以为傅斯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后来去听了他上别的课，才知道他是个通人。他的学问之大，一般教授是赶不上的。后来同学们佩服他的学问，去听课的人很多。杨向奎先生也回忆说，“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教授阵营是整齐的，都是一时之选”，他在列举历史系教授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傅斯年，说他“是有才华的学者，才气纵横”；说他讲课“大气磅礴，上天下地，无所不及”，“是一位渊博而有开创性的学者”。杨志玖先生谈到他旁听傅斯年讲课的感受时说：

1934—1937年，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时，曾旁听过傅先生的《先秦史专题》课。我虽不能完全领会他讲课的内容，但对他发表的独到见解，对史籍的熟悉，旁征博引、融汇中西的学识以及滔滔不绝的口才，却深感新奇和钦佩。他时而背一段《左传》，时而翻一篇英文文献，中西互证，左右逢源，宛如一位表演艺术家，听他的课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傅斯年不是一个只会在讲堂上传经布道的教书匠，他不仅书教得好，行政工作做得很出色。他除主持史语所日常行政工作以外，对北京大学校务工作亦多所献替。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就把他和胡适视为自己的左右膀臂。蒋氏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方局势动荡不安。



19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华北危机。4月，史语所南迁上海。次年底再迁至南京。这一年，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提议，将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划归历史语言研究所，列为第四组，并更名为人类学组，聘请吴定良为主任。

史语所南迁沪、宁，傅斯年未随同前往，他仍留居北平，执教于北京大学，同时继续担任史语所所长职务。1936年春，因工作需要，傅斯年辞去北大教职，移家南京，亲自主持史语所工作。一年之后，他又离开南京，率领史语所各组开始了飘萍不定的迁徙生活。

自1928年至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址先后九次迁徙。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发展时期，每迁徙一次，研究人员便增加一次，研究计划便扩充一次。殷墟的15次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收藏整理，大量的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的调查，语言实验室的建设，都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若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发生，史语所照以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它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成绩